



对王国维书信日期的订正——附罗振玉有关书信的订正（张颂之）

张颂之

对王国维书信日期的订正[1]——附罗振玉有关书信的订正

内容提要：本文对目前所公布的有关王国维的书信，主要集中在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、《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》、《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》、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，作了详细研究，依据信中所涉及的事件或诸信之间的关系，并参照其他一些可确定的记载，对其中一些书信的排列时间重新作了考证，订正了以前各种编排的错误，这将有益于我们对王国维学术及生活更加准确的了解。同时，也对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中有关罗振玉的书信日期也作了考证，纠正了其中的编排错误。

关键词：书信 王国维 罗振玉 考证

王国维是现代举世公认的学术大家，他在史学、文学、美学、哲学、文字、考据、音韵、器物、校勘、目录等众多领域中均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的自沉，是自他死后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。至于王国维和罗振玉的交往，依然是个热门话题。两人密切交往近三十年，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罗振玉督促、帮助的结果，并结成儿女亲家，最终也因此而导致两人绝交。对于这些问题中的是非曲直，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，因为对罗、王二人的了解及资料的限制，对这些问题人言人殊。不过自八十年代以来，学术界陆续公布了罗、王的信件，这对揭示罗、王之间的交往及王国维的学术历程、思想变化，有了较为可靠的证据。

这些已公布的有关王国维的信件主要集中在：罗继祖整理的《观堂书札》[2]；吴泽主编，刘寅生、袁英光编的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[3]（下简称《全集》）；王宇、朱金枝整理的《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》[4]（下简称《书札》）；刘金库整理的《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》[5]（下简称《手札》）；刘寅生、房鑫亮整理的《王国维家书》[6]；王庆祥、萧立文校注，罗继祖审定，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的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[7]（下简称《往来》）。其中《观堂书札》，后绝大部分收入《全集》，可不论[8]。《全集》收王国维书信“五百余通”，可谓王氏书信的大宗。《书札》与《手札》均因《全集》未收而公布。《往来》“共收录现存已知罗振玉、王国维往来书信共974函，其中罗札697函，王札273函，两氏家属代笔4函”[9]。当然，这些被公布的书信并不是王国维所有书信的全部，《书札》说：“有王国维亲笔书札，皆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所未收者。今择数通，据原件标点，并略加说明，公之于众。”《手札》则是从九通中整理并刊出八通。《家书》则从近百通中整理公布了二十一通。显然，就已公布的情况看，我们所看到的有关王国维的书信绝不是全部[10]，更无论那些也许还存在于世间的某个角落而等待被发现的书信了。

这些已公布的书信，虽在不同的结集中有某些重复，但众多信件的面世，却使得我们对王国维的书信次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，并可借助这些书信所反映出的问题、事件等线索，对每一封书信的历史定位有了相对可靠的证据链条。

但困难还是继续存在，因为一些书信没有年月日，或无年月，多数书信有日期，有月日者甚少，还有一些书信则为残札，不是缺首就是缺尾。这些情况对如何编排各书信之间的前后次序带来相当的难度。因此，以上各种成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误，这对深入了解王国维的思想及情感显然带来了一些困难与障碍。

由于这些书信编排的错误，致使有关王国维的一些研究著作也随之有误。如，袁英光、刘寅生合编著的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1917年：“8月，撰《唐韵别考》。8月27日（七月初十），致沈曾植信说：‘今晨拜教，至快。《鹤山唐韵后序》顷录出，并拙撰《唐韵别考》稿同呈上。’”[11]此结论不审何来？沈曾植于1917年6月下旬北上参加张勋复辟，复辟失败后，沈曾植到8月27日还没有回到上海，王国维如何能拜教之，又如何可能给他写信？王国维撰《唐韵别考》从其它的材料中可知是1917年8月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不会在此时拜教沈曾植。如果此信日期是初十，则一定是10月25日或以后几个月中的事；若此信有“七月初十”字样，则应是次年之事；因为王国维对《唐韵》的研究的确在1917年，但他直到1918年底，尚继续《唐韵》的扫尾工作，他在19181221信中说：“近日改定《唐韵别考》、《音学余说》二种为《声韵续考》一卷。”再如，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1917年“9月2日，辞谢蔡元培欲聘为京师大学教授之请。9月4日（七月十八日）致罗振玉信说：‘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，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，即以他辞谢之。’”[12]此处的依据就在于《全集》对所引书信的考订：“据此札，知辞谢蔡元培京师大学教授之聘，事在丁巳七月十六日。”[13]这封信在《往来》中正提前了一个月，且《往来》对此信的排序是正确的，而《全集》对此信的排序是错误的。依据《往来》的排序，王国维辞谢蔡元培之请在8月3日（丁巳六月十六日）。由此可见一斑，对王国维书信时间的准确定位对研究王国维是具有意义的，对理清王国维的学术思路及思想变化，也有重要的价值。

现将上述已公布的信件集中到一起，通过对王、罗之间的往来及事件线索，对其中有关书信排序中所能发现的错误试加订正（其它信函，由于线索太少，不能顾及[14]）。同时，对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中罗振玉的书信日期误排者，也一并加以订正，因为罗、王的通信往往前后呼应。其不能发现者，或误考者，则俟诸博雅。

一

《书札》，共十通，其中有九通致罗振玉，一通致刘大绅。这些信件的日期考订也都是正确的。其中第四19180528、第五19180625、第六19220413、第九19230216四通信是《往来》中所没有收的，这正是对《往来》的补充。第十通，整理者说：“读《吴信》（p350），知王国维进京后最初几天行止，故定此信日期。”但整理者并没有给出日期，也许是排印的遗漏，这信的日期在《往来》中是19230607。

二

《手札》，共八通。这八通书信，除第八通信外，其余七通均未被《往来》收录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。其中，除第四、第八两通书信的日期考订正确外，其余六通书信的日期考订不是错误就是没有考出。兹对其考订错误者重新考订并将未考者考之如下：

第一通：整理者定为19170425，谓：“从‘君楚想早抵京都’可知是1917年3月，同富冈君携来沪日期又吻合，故推此札作于1917年4月25日。”从第一通信中可知当时“富冈君在此

各处皆已去过。前晚刘翰怡约晚餐，即观其及书致佳”，落款是“初五日晚”。但从《往来》的排列看，此信应提前一个月，具体日期是19170327。我们还可从《往来》中进而考知富冈来沪后的活动：250页之19170323，王国维“闰月朔日”致罗振玉：“富冈君到后，因语言不通，将一切介绍事，尽由维办理，已与之同访乙老及艺风，昨日并观徐积馀藏镜及铜器。艺亦来徐处与之同访张石民，观诸宋本，星期日约定观刘翰怡书，则其事了矣。刘葱石入京未归，瞿良士去做议员，故富冈君至常熟恐不得观书耳。张石民家有一新兴镜，与《图录》所载者略字而多一句，富冈得其拓本，甚得意，又积馀有吴国仲里周冲镜，亦奇……乙老与富冈谈甚喜，积馀待客亦周挚，并闻。”此信中的“星期日”是闰二月初三（3月25日），这与第一通信中的“前晚刘翰怡约晚餐”正合[15]。253页之19170404王信谓：“君搆昨晚自杭归，今日往来，彼此相左，闻以明日行矣。”《往来》所收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也有富冈的消息，如245页之19170310罗信：“富冈不日赴沪，将访公”；251页之19170328罗信：“君搆到沪晤乙老，归来又增骂东儒之材料”；19170331罗信：“富冈君搆当已他往，闻二十日后乃返国”；256页之19170411罗信：“君搆到此，尚未见面”。即是说富冈在4月11日前已回到了日本，因此，4月25日他不可能还在上海。其实，在《全集》185页，有19170320致徐乃昌的信，拟商陪同富冈前去参观其收藏；同页还有19170323致罗振玉的信，向罗振玉报告富冈在沪的活动，这也说明第一通信的日期整理者的考证是错误的。

第二通，整理者以信中提到日本米价风潮而定为19170831，此信又涉及到王国维报告沈曾植的病与“《雪堂叙录》已印成卷二”，整理者就《雪堂叙录》有注说：“洪国樑所著《王国维著述编年提要》第77页中列入1918年，谬也。”看来错误的不是洪国樑，而是整理者。因为沈曾植在1917年7、8月北去参加张勋复辟，至8月底还没有回沪，据王遽常《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》，“（沈）旋又赴天津，淹留北地，乃至两月，常以不得死所为恨。七月杪，航海南还。”[16]此年谱中的七月是农历。这从《往来》中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也可知道沈曾植是在1917年9月上旬底回到上海的，如289页之19170908信谓：“寐翁闻不日可到，潜则已赴旧居矣。”290页之19170913信谓：“寐翁于四五日前抵沪，前日往候之，身体甚健，有客在，不甚多谈。”291页之19170914信谓：“寐言和兰之赚横渠，乃因曼倩先有此计，英法知之，乃令和出面为此。此事渠至津始知之，亦一异闻也。”即是说，沈曾植回上海是在9月8日至10日间，在此之前，沈曾植不在上海而在北方。既然沈曾植不在上海，王国维如何能知沈曾植有病？显然这第二通信排在1917年是错误的，而应排在1918年。又，《往来》402页之王国维致罗振玉19180813信谓：“《雪堂叙录》已排好，因纸料不足，未能全印，”这正与第二通信内容衔接，《往来》这前后的其它往来信件中也多次提到《雪堂叙录》的有关事情，如19180605、19180616/17、19180704、19180718、19180724/25，等等。再说，日本米价风潮也发生于1918年，《往来》此年的许多信件也都提到了米价风潮，如19180719、19180807/09、19180813、19180814、19180822、19180823、19180829、19180925等信。对此，《全集》272页的注是正确的。可见，第二通信应排在1918年而非1917年。第二通的落款日期是秋天的“十四日”，那么，其具体时间应是19180820。

第三通，整理者考订的时间是19180623，信的主要内容是：研究《切韵》、江浙水灾、落款为初六、附初八晨又接来书并知君楚误服药。从第三通信的日期是初六看，若排在1918年6月份，此日应是14日，而不是23日，且《往来》376页正有这一天罗的信，却与这第三通信没有任何关系，《往来》376页前后各信与第三通信也没有关系。看来第三通信的日期排序需要重新考虑。

罗福苕去世的时间是1921年10月底，我们就以此为底线，看看1921年的情况。据其它史志记

越，江浙一带有水灾的年份是1917、1918、1921年，1921年显然是一个符合我们要求的一个年份。1921年是王国维研究《切韵》的又一个年份。我们还是依据第三通信的主要内容从《往来》中找一些内在的线索。516页之罗振玉致王国维的19210617信中说：“小儿在沪抱病，虽为之父母者日夜忧悬，亦无以感偏僻者之心，亦但有听之而已。诸荷关垂，至感至感。”此时罗君楚在上海病重，受到王国维等人的关心。同页之罗振玉致王国维的19210803信中说：“迩日各省水害区域致广，南中产米之区，若均付之巨浸，则秋后将有所亡之叹。”这说明水害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。罗君楚在沪病重，由沪回天津是在8月中旬，王国维致长子王潜明的19210815家书中说了这一情况：“君楚拟于此次新铭船赴津，此次出于自动，真始意所不及。君羽于下次携行李等行。”[17]罗君楚由上海返回天津后，《往来》517页之19210904，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说：“弟今日因三小儿妇料董医事，碌碌无可言。所可言者三事：……三、伯希和代照《切韵》已寄来，计残卷三，其一为《切韵笺》，但存上平之半，他一为《切韵》陆氏本，缺去声，其它亦有小缺，又一则陆氏《切韵》少许，缮写皆极草率。弟已比较《唐韵》（蒋本）《广韵》，作《均目表》，此三事也。”《往来》517页，罗振玉致王国维的19210916信也提到了《切韵》，这说明新材料的到来已引起了两位大师的深刻关注，并立即投入到了研究之中。《往来》518页之19210923，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说：“《切韵》已查，冬韵有董无冬，《集韵》所引陆羽语，唐写所无，而《倭名类聚》所引则尚未一检，不知果在卷中否也……小儿反津一月，用药提脓，创部渐愈，大约此次可以不复留毒，至内脏亏损，现赵医用参、术、天冬、生地等药，阴阳平补，颇有效，近日已啖饭，今日午餐居然一碗又半。然此儿乖谬之性总不能去，惟恐饮食寒暖，不能小心，致生枝节，然亦但有付之天命矣。”此信中又提及罗、王两位大师研究《切韵》事，并提及君楚返回天津一个月，在罗振玉身边医疗，且有成效；同时此信中还涉及到了河北及淮上的水灾。《往来》519页的19210927、192109、19211005罗振玉致王国维的各信中均提到了《切韵》，罗振玉在19211005的信中又说了一个重要情况即君楚误服药：“前数日因小儿误服洗疮药，甚危险，现用温补之剂挽还，渐得复常。”这一情况，在王国维的第三通信中得到了反映，虽然此信王国维写于初六日，可是并没有及时发出去，到初八的早晨王国维就接了罗振玉初五（即19211005）的来信，因此，王国维的信中有：“初八晨又接手书，敬悉君楚误服药，想以渐复。”从上面的种种情况看，第三通与以上各信内容可相互应和，由此看，该信的日期应是19211006/08。

第五通，整理者考订的日期是19181012，此信的落款日期是初八、初九日，整理者说：“从《校松江急就篇序》写成的时间是1918年10月底以前，及君楚之病于10月，可知此通为1918年10月12日。而在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第276—277页，尚有同一天之书札，据核对及查核《中国近代史历表》可知，后一书札日期在10月13日或以后，而记之为重阳日，属大概日期。”第五通不见于《全集》及《往来》，而《全集》及《往来》均有日期为19181012的信，且落款日期为初八日、重阳日。由此看，第五通信与《全集》之19181012信的落款日期都有初八，一有初九，一有重阳日，且内容也绝不同，无论如何推想，这绝不可能是同一时间内写的两封信。

从《往来》诸信的前后关系看，这第五通不应排在10月，而应排在9月，其具体的日期是19180912/13，因为罗君楚生病在8月，入院是在8月下旬，404页之19180822，罗振玉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：“阿荃又病矣，寒热肋痛，医者谓恐是肋膜炎，”406页之19180827，罗振玉在信中又说：“阿荃昨延贺医生，渠劝至大学医院。”此时罗君楚已入医院，因此，408页之19180830，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就询问：“顷接十六、十八两日手书，敬悉一切。君楚之肋膜炎目下想已就愈；君羽在淮想因事耽搁行程，未必体有不适，”409页之1918090

3, 罗振玉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:“阿荃在病院一星期矣,热退十之七八,全愈尚不知在何时。”从这种种关系看,第五通信应系为19180912/13,不是19181012。

第六通,整理者未定年代,从信中内容看此信应写于1918年,因此信中有《雪堂叙录》准备印,又信中有端午节,端午是6月13日,则此信日期当19180612/14。

第七通,整理者未定年代,其内容涉及景叔处的秦量、鬲、承安镜等,从《往来》中的前后信中看此信的日期应是19180122。又,《往来》334页之19180123/24,王国维致罗振玉说:“今晨君楚到,携来赐书并《龙龕手鉴》等,敬悉一切。景叔处之《樊君鬲》晨又携来,云索百五十元,大约百二十元可售(言中币),而其人需款甚亟,或以百元作抵押,明年二月底再定云云。正拟至纬君,询问有钱与否,而君楚适至,因与商议与以日币百五十元(值中币百三四元)。刻往告景,景云此器已见价百元,必须稍加乃可,或不允,则加日币十元何如,永诺之。其器出土颇久,但未著录耳。承安镜渠以三元得之,其永安镜实未售出(不知是否渠物),其函中云售者不然(渠言中无意露出)。”这是1月23日的记载,次日,王国维继续写道:“昨晚景来函云,鬲以日币百六十元购成,今日午付款,即向君楚取款付之。鬲已交来,即交君楚带奉。”这两信内容正相吻合。

三

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早出,在学术界影响也大[18],但受时代条件的限制,其中一些书信日期的考订是错误的,故有纠正其错处的意义。

99页之19160804,误;此信又见《往来》143页,系19160901,是。此信在《往来》中与前后多信能呼应,不繁举证。[19]

107页之19160823/24,半是半误;此信又见《往来》124页,系19160724/25,亦半是半误。信由两部分构成,一是“廿五日灯下”部分,一是“廿六日晨”部分。依据本文的看法,此信当是整理者(可能是原初整理者)误将不相干的两信连在一起,致使此信前后两部分的内容不能吻合,也正因为是误连,致使《全集》和《往来》对此信的定位顾此不能顾彼。因此,必须将此信分开,将此信中的两日分属不同的月份。《全集》对廿六日晨(0824)信所系时间是,而对廿五日灯下部分系时则误;《往来》对廿五日灯下(0724)系时是,而对廿六日晨部分系时则误。兹考“廿五日灯下”部分如次:信中谓:“此间天气大热三日(九十七度),前日雨后顿凉,今日天晴气清,亦复不热。”[20]94页之19160722/23信(又见《往来》121页,系时同)谓:“连日苦热,昨欲雨而未成,刻又风作,大雨将至矣。”再查《郑孝胥日记》,1916年7月20日记载:“连日始热。”21日又载:“热甚,至九十度,雷作,雨未成。”[21]与此信中的天气苦热正相合。而《郑孝胥日记》1916年8月20日记载:“凉甚。”[22]8月25日又载:“风雨骤凉,御夹衣。”[23]这显然不合信中的天气。故此“廿五日灯下”信当提前一个月,以《往来》所系为是。“廿六日晨”部分之考证见《往来》部分。

111页之19160830,误;此信又见《往来》108页,系19160701,是。此信中有沈曾植与王国维相互唱和的伏日诗,入伏无论如何都是7月中旬以后的事,显然沈、王在伏日还未到就有诗,就作无病呻吟。信中谓:“季英太夫人昨今病势又亟,恐不测即在日内,今日内人往始知之。”说明王国维此信始知季英太夫人之病。而季英太夫人之病,在《往来》110页之19160704/06、111页之19160707罗信及此后诸多信函中均不停地提及,无须引证。此信又谓:

“君羽吉期择日事，已托尧香付日者算之，公之甲子误书丙辰，已改书丙寅矣”。这说明王国维此时刚托付罗振玉等人八字于张尧香。罗振玉托王国维请人谏吉是发生在五月廿七日，《往来》106页之19160627罗信谓：“小儿福葆拟于明岁为之婚娶，惟照例须早日谏吉，以便通知女家。兹将男女八字及翁姑年命开单奉寄，敬求转托张尧香觅一日者照例谏吉。”则此信当书于六月，故以《往来》为是。

114页之19160906，误；又见《往来》132页，作19160807，亦误。此信当系19160708。考见《往来》中对此信的考证。

156页之19161211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230页，系19170110，是。又，《往来》224页之19161231罗信，是罗振玉告诉王国维张烈女事，与此信内张烈女事内容正吻合。

210页之19170903/04，误，此信又见《往来》275页，作19170804（/05），是。《全集》编者的理由主要是沈寐叟事迹和上海的气温变化，这固然是重要的线索，却不是唯一的线索。此信中的其它内容还可证明《往来》的排序是正确的，如：一，王国维的著作问题，《往来》274页之19170730罗信中以中日之间的“邮程八日，何其迟也”而慨叹，并向王国维索要：“《殷先王公续考序》、《殷虚书契序》、《殷文存序》、及《待问编》中公所续识之文，均祈写赐，幸勿再却。”故王国维收到罗信后于8月5日回复：“《殷虚书契考释》考及新释字已于前日寄奉，兹先将《殷先公先王续考》附寄”，278页之19170810信王国维又说：“前日寄一书，并《殷先公先王续考》稿，谅达左右。”280页之19170814信：“《殷文存序》前因敝处仅有草稿，又疑哈园印存之本已寄尊处，故未奉寄，兹将草稿录呈。印本与此本均稍改数位，不同亦不妨也。”283页之19170820罗信表示收到《殷文存序》，以上各信吻合。二，《唐韵》研究及音韵研究问题，这是此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，也是一个重要线索，可与《往来》中19170723、19170810、19170811、19170814、19170818、19170820（初三夕）、19170825、19170827诸信相合，均涉及这一重要问题，文繁不引，此一问题也是前后密合。三，王国维在8月底开始构思后享大名的《殷周制度论》，《往来》中19170901（初说此计划）、19170908（应作19170909，写作脱稿）、19170913（写定）三信中反映了王国维写作《殷周制度论》的速度，这也说明他不会在这几天中还继续沉醉在《唐韵》研究中。由此，《全集》编者对此信日期的考订是错误的，其中“据此札，知辞谢蔡元培京师大大学教授之聘，事在丁巳七月十六日”的论断也是错误的。

231页之1917未致柯绍忞信，未能定日期。《往来》325页之19180102罗信谓：“得初八日手书……公言致凤书，岂致玉老书之讹耶。正拟发函，得初五日手书，想即遗失初六日未到之书也。凤老久不通信，读此书始知公致书凤老之说。”据此可知，罗信是接王国维“初八日手书”的回复，《往来》319页之19171221信，正是王国维初八的信，中有“今日作致凤老书”，并未言及问业事，所以导致了罗振玉“岂致玉老书之讹耶”的疑问。则致柯绍忞信当书于初八，故此信当系为19171221。

270页之19180912/13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538页，系19220702/03，是。又，此信与《往来》535页192206罗信、536页之192206罗信、19220709、19220808、19220824/25诸信内容前后相合，且《往来》535页有注谓商承祚于1921年秋拜罗振玉为师。

274页之19180928，误。此信又见《往来》408页，系19180830，是。此信有君楚肋膜炎及君羽留淮事，君楚病事可与《往来》19180822、19180827、19180903、19180915、19180918罗、王两信、19180923诸信互应。君羽留淮事（因其妇病亡）可与《往来》中19180731、19

180807/09、19180814、19180918、19181001诸信相应合。君羽到日本是在9月17日，19180918罗信中有“阿葆昨日归，归即病，呕吐腹胀”可证。

300页之1919，误；此信亦见《往来》490页，系192002上旬，亦误。当系192002中旬。《全集》此信注：“此系残札。其年月难以考定。视所云宋警事已屡闻之于孟莘推测，此札书于己未庚申之间。兹暂系于1919年之末俟考。”可知《全集》定此时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但此信之内容在《往来》中有数信可与之互应，如489页之19200207罗信，罗振玉算命后向王国维要其八字，故王国维于此信中出示了八字，并谓：“前日接手书”，王国维“前日所接手书”当即19200207罗信，再计算上邮程时间，则王氏此信必书于本月的中旬。又，《往来》493页之19200311信，有罗振玉向王国维汇报算命的结果的内容。且19200207罗信中有为刘翰怡编《金石续编》事，亦与《往来》中19200128、19200216、19200225、192003中旬、19200601、19200607等信中的《金石续编》事相合。

302页之19200210，误；此信亦见《往来》484页，作19200111，是。此信涉及梁鼎芬身后事，梁鼎芬去世时间是十一月十三日（1920年1月3日），故写于廿一夕的此信谓：“此间于廿四日公祭节老，由乙老发起，共十四人，凡与节老有旧者均可往拜也。”上海同人公祭梁鼎芬事，又见《郑孝胥日记》1920年1月14日。[24]当以《往来》为是。

307页之19200423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499页，作19200620，是。又，此信内容之一是交上“筱帆中丞所索张烈女诗”，这与《往来》498页之19200607罗信：“张小帅托致意，渠催张烈女诗已数次，千祈讯寄，”499页之19200624罗信：“顷奉示及咏烈女诗，拜悉，遂即将诗稿交静渊中丞不误，”501页之19200710罗信：“致南皮中丞诗，已送去，属致谢意”诸信内容相互吻合。故以《往来》是。

321页之19220320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529页，系19220418，亦误。《全集》考证：“札中所云‘松老贖款’事，与廿一日札相承。……此札当书于二月。”所谓廿一日札即《全集》320页之19220319（又见《往来》524页）信，廿一日札谓：“陈松老事庸庵处已募得五百元，……庸庵即自行汇出，……孟莘允转募，或可稍多，然其所欲募之贵州银行家朱晓南已为庸庵所募矣，恐亦不能多也。”而此信则谓：“昨晤孟莘，云松老贖款渠处可集得五百元。”此两信之记载显然不是同一时间的事。故可断定《全集》的考证有误。此信又有罗福苕死后墓碣事，并谓：“志文中乙老撰者，‘古今梵天书’夺一‘书’字，似重要，不可不补，古志中有补字例。维文中……将来上石，或请式之先生改书七字剜补，何如？”即是说王国维写的墓志还没有刻到石碑上。则此信与《往来》中19220131（乙老写墓志）、19220313（请王国维写罗福苕妻墓志）罗信、19220324（请章式之书写）罗信、19220503罗信（当系19220602，考见后）诸信内容前后正合。又，信中谓：“近闻内廷有旨召季秀皋，欲令清理皇室财产，此事自不可缓。”《郑孝胥日记》1922年5月29日记载：“胡琴初来，言刘健之媚臧斯敦以求清理皇产大臣：李季高加太保衔，催令来京会办清理皇产，季高云，节后赴京。”[25]胡琴初此前就见于郑孝胥的日记，如4月25日就有其记载，当时并没有谈及李季高[26]。看来计划以李季皋清理皇产，胡琴初也是在5月知道的。则依据相关信，此信当书于四月，系为19220518。又，此信中有“季秀皋”其人，下又作“季高”；《往来》则作“李季皋”，下又作“季高”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，当作“李季皋”。则《全集》之“季秀皋”，当是整理过程中文字辨认转写之误。

329页之19220929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546页，系年月同，亦误。当系19221028。考见《往来》部分对此信的考订。

341页之19230121, 误;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559页, 作19230321, 是。又《往来》555页之192301中甸罗信、558页之19230307、560页之19230320罗信、562页之19230422罗信等, 与此信内容正前后衔接, 文繁不引。

358页之19230715, 误, 编者定此时间的理由是: “札云南斋入直办法……查癸亥五月十八日致王文涛札有云‘毅甫尚未来, 故弟辈入直办法尚未商定’, 则此札当书于该年六月。据此札, 知《魏石经续考》草稿成于癸亥年六月初三。”此信又见《往来》579页, 系19230815, 是。此信内容还涉及“息侯处小丧”与“华宗头眩”事, 可与《往来》578页之19230812(七月朔)罗信内容正相合, 故当以《往来》为是。则《全集》此信注释中之“《魏石经续考》草稿成于癸亥年六月初三”的论断也是错误的, 《魏石经续考》草稿当是成于七月初三。

380页之192401, 误, 此信不署日期。又见《往来》605页, 作192401中甸, 亦误。此信当系192405中甸以后。考订见《往来》部分对此信的考证。

382页之19240126, 误;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15页, 作19240424, 其原因已由罗继祖的按语说明, 不引, 亦误。此信谓: “午后三时往访上公, 告以日磬告公之言, 上公始惊, 谓今日当上偕庄赴颐园, 得非此事。”信中“上公”指荣源, “庄”指庄士敦。溥仪去颐和园, 据《郑孝胥日记》记载, 是在1924年5月24日, “上云: ‘即幸颐和园, 随扈。’至四时, 自玉泉山静明园回宫。”[27]。则此信正确的日期应推后, 即《全集》推后四个月, 《往来》推后一个月, 当系19240524。《全集》此信以下数信与此信密切相连, 亦均误, 无须细考, 亦当顺应改: 383页之19240126(廿一日初昏), 此又见《往来》615页, 作19240424, 亦误, 应系19240524; 384页之19240127,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16页, 作19240425, 亦误, 当系19240525; 386页之19240130,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17页, 作19240428, 亦误, 当系19240528; 387页之19240131,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18页, 作19240429, 亦误, 当系19240529; 388页之19240201,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19页, 作19240430, 亦误, 当系19240530。以上诸信只有如此排列, 方可对溥仪出游事件后诸遗老的反应有一个合理的说明。

389页之19240205, 误;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07页, 系年同, 亦误。考订见《往来》部分对此信的考证。

405页之1924, 此信致沈兼士马衡, 不署时日。信中谓: “昨阅报纸, 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《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》, 不胜骇异。”《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》至少在8月9日就已经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发表。[28]王国维信中的“报纸”不知是否就是确指《北京大学日刊》, 抑或是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发表此宣言前的某份报纸。再据《往来》635页之19240909罗信(误, 当系19240811, 考见后), 则此信当书于罗信之前。暂系19240811前。

408页1924致罗振玉, 未定出时间;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28页, 系19240713, 是。

425页之“初九”信, 仅系年1925, 误;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52页, 系19260122, 是。

453页之“十四日”信, 未定年月; 此信又见《往来》597页, 系19231121, 此一时间大误, 当为19260127。有关此信的考订见《往来》部分。

453页之“十一日”信，未定年月。此信又见《往来》602页，仅系为1923，大误，当为1918 0520。有关此信的考订见《往来》部分。

454之“十五夕”信，未定年月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539页，系19220709，是。这与《往来》536页之（七二五通）192206罗信、534页之19220702/03诸信内容相合。

455页之“十二日”信，未定年月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433页，仅有系年1918。此信当系1918 0521，考订见《往来》部分。

454页之“廿八日”信，未定年月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344页，系19180209，是。此信谓：“知政局将有变，东海将出”，东海指徐世昌，东海将出指徐世昌将出任大总统，徐世昌于1918年10月10日出任大总统。

455页“廿六日”信，未定年月；此信又见《往来》491页，作19200225，疑误。此信当为19 170711。具体考订见《往来》部分对此信的考订。

89页之19160707/08，此信又见《往来》112页，系年同，均不误。但陈鸿祥著《王国维年谱》第180页引此信，并将此信日期定为8月5日，误。陈著随后有对此信及相关信件的考订，却忽视了信中所提及到的时在梅雨。兹介绍一下梅雨的情况：根据1885—1974年上海、南京、芜湖、九江、汉口五地降水资料统计，入梅日期80%以上在6月份，尤以6月中旬最多，占31%，最早入梅期是1896年5月26日，最晚入梅期是1947年7月4日，相差40天。出梅日期62%在7月上中旬，最早出梅期是1961年6月16日，最晚出梅期是1954年8月1日，相差46天。梅雨期最长的达65天（1896年5月26日到7月30日），最短的仅只6天（1971年）。如果此信确如陈著所谓的8月5日，则我们的气象学者的统计就有误了。在《往来》此信前后的许多信中都提到了梅雨。陈著对此信的考订显然过了。

四

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后出，对罗、王的往来书信收罗宏富，并依据信中所提供的线索给每封信作了时间上的排序，不能不说极有功于学界。但其中一些书信时间的考订也存在失误，既有《全集》不误而重新误排者，亦有混乱了书信中的关系而致误者。兹通过《往来》与《全集》两书的对比及梳理各书信间的内在关系，试对《往来》中误排的书信重加考订。同时，对涉及到的罗振玉书信的误排也一并加以订正，因为罗振玉书信处处与王国维密切相关。注意的是，其中有数日相连的书信，本来是不相连的，可能是后人的误连，本文也通过信中的内在联系将之分开。

57页之19160411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76页，系19160510，并有注说明其系年之理由，是。此信还有几个线索可继续给出确定其日期的证据，其中一个重要线索是罗君楚当时在沪。罗君楚曾经在3月随罗振玉回家乡扫墓，他们是在3月中旬回到日本的，《往来》50页有191603末罗福苕致王国维信可证。君楚在回日本途中还曾生小病，似不可能回日本后立即又返回上海。74页有19160503罗振玉致王国维信谓：“昨遣儿子匆返沪。”因此，77页之1916 0507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：“昨日午后楚到”。又，69页之19160426王国维致罗振玉：“程冰泉尚未到，而日币日落，渠迟到一日恐须受亏一日”，与此信中“其日币损失距书到时价在百元以上矣”也正相合。不过在《往来》80页有王国维致罗振玉的5月8、9、10三日的一封信，此信写了三天，10日仅写了一点，并且也提到君楚。估计王国维在10日发出8、9、10三

日信后，又新写此信。故推断《往来》的考订误，当以《全集》为是。

96页之19160605罗信，误；又，94页有19160605编号相同的罗信，信颇长，有写《待问编》的内容，且落款为“端五”，不误。而96页信落款“初五”，其内容有“近日《石鼓表》及《石鼓文》共十九叶，已写印了。笺仅写二鼓，其它八鼓恐初七外乃可成”，信中还提及日本的梅雨。则此信之“初五”显然不是94页信的“端五”。同一天有如此两封信，内容不相干，且落款也不同，则显然有矛盾，故断定96页信的排序有误，此信应推后一个月。再，112页之19160707/09王信：“沪上梅雨亦多，至今未见开霁。”从《往来》前后信中有关《石鼓文》的内容看，信中谓：“近日《石鼓表》及《石鼓文》共十九页，已写印了。笺仅写二鼓，其他八鼓恐初七外乃可成。”此信也应推后。104页之19160625罗信：“现方写《石鼓文考释》，下月内当可成”，107页之19160701罗信：“弟近写《石鼓异同表》，已印成，近方写《石鼓笺》及临写本文”，110页19160704/06王信：“《石鼓文考》已写出，甚快，大约月杪总可读也。”[29]115页之19160713罗信：“弟写石鼓已竟，约二三日后可印成，尚须作校记二三纸，序文一纸。”此信推后一月，应系19160704。

98页之19160611罗信，误，信中谓：“伯希和昨有信来，已转往北京使署。”伯希和来上海是在六月，张元济等人于六月二十二日设宴招待过伯希和。[30]伯希和事迹上海之行又见19160727/28王信（《全集》95页、《往来》125页）。则此信当书于七月，系为19160809。

104页之19160625罗信，误，此信落款为廿六夕，查年历当为19160626。

105页之19160626罗信，误，此信落款为廿七夕，查年历当为19160627。

113页之19160710罗信，误。罗振玉在信中说：“《南宗衣钵跋尾》明日当能印成，弟已属博文主人寄十二分交尊处，请公留一分，以一分赠抗父，其余十分请交二分与景叔，余八册交子敬为荷。”但是，114页之19160711/15王国维信说：“交来《书契后编》三书各二部，《南宗衣钵》册二卷二，《大云经》一册。以《书契》等三书，《大云经》《南宗衣钵》册一卷二送乙老处，渠回书属先行于函中谢。傍晚抗公来，出示手书，乃知一册二卷乃先生重赠维者。然此二册维已有之，而乙老处尚无，则送去谅亦不误也。乙老处《南宗跋尾》，乙老前日出示公函，有请其将跋尾批评之语，故以维之一本与之，将来有便时请赐一本也。”此两信紧密相连，可前者的《跋尾》还没有印出，而次日王的手中却早有一本，这里显然有矛盾。如果前信不误，则114页之19160711/15信当是下月之事。若是，则当19160810/14。但《往来》133页有一信编号于此日，且133页之19160810信有作《两汉博士考》的内容，与19160815、19160816、19160821、19160903、19160904、19160911/12、19160914、19160918/20/21、19160925/26、19160930、19161022、19161028、19161105诸信内容前后吻合。由此可知114页信不误，不能推后，误的应是113页之19160710。又，《往来》105页之19160626罗信谓：“《南宗衣钵跋尾》此间大受欢迎，”正与113页此信内容吻合，故113页信应提前一个月，系为19160611。而98页有一罗信系为19160611，则98页信当推后二月，系19160809，考已见上。

116页之19160717“十八夕”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《待问编》今日印成，序尚未写印，计五十纸，不可识之字一千零三。”此信应提前一个月，系19160618。又，《往来》中有关于《待问编》写作、印刷、交流的事考证如下，94页之19160605罗信：“弟近写《书契待问编》，一日三纸，劳苦万状，今日已成六纸，恐已是廿分之一，”97页之19160607罗信：“连日写《待问编》，穷日之力，仅能得三纸（每纸二十二行耳），今日写至第十五页，约

得四分之一，然则此书殆六十页左右，必有千名，”100页之19160615罗信：“连日校写《书契待问编》，已写成四十纸，印成者三十纸。……此次写定，未能悉举无遗……此书三日可具，而须作一序文，恐印成亦须月末矣。”此信正是接这三信的，故应提前。

120页之19160719/22，误。此信又见《全集》105页，系19160818/21，是。此信写了4天，最终落款是“廿三日灯下”，121页之19160722/23信又写于廿三、廿四日午，两信在时间上构成了矛盾，即“廿三日灯下”后不可能还有一信继续写于廿三日，且还没有写完，再写到廿四日午。此信又谓：“所云角力而败者，亦系旧事，如维前书所料也。”说明此前有罗振玉的提问和王国维的回答。《往来》132页之19160810罗信问：“乙老书来，颇及近事，并言渠与康角三日而败。公能知其详否？”而135页之19160815信，王国维表示不知：“渠所言与康角者，不知其事，抑指渐臺事数日事耶？”此信正是进一步回答罗振玉之问的。此信又谓：“日来作《两汉博士考》，稍有眉目，”王国维作《两汉博士考》是8月份及以后的事，可与《往来》中19160810、19160815、19160816、19160821、19160903、19160904、19160911/12、19160914、19160918/20/21、19160925/26、19160930、19161022、19161028、19161105诸信内容前后吻合。信中又谓：“近沪上最有兴味者为私土案。”《郑孝胥日记》1916年8月11日记载：“报言，云土凡六十箱，所搜得者才二十余箱。”[31]与信中所谓私土案亦合。故此信应推后一个月，系19160818/21。

124页之19160724罗信，误。此信罗振玉致王国维：“顷《书契待问编》装样已来，亟奉寄一部。此书舍公外，殆无第二人能读之者。”《往来》111页之19160704/06王信说：“今日接邮局通知书，知《待问编》到矣”。此信当提前一个月，系19160625。

124页之19160724/25，半是半误；又见《全集》107页，系19160823/24，亦半是半误。在《全集》部分我们已经将此信分成两部分，并对廿五日灯下部分已考，当系为19160724。兹对廿六日晨部分试加考证，《全集》整理者已经注意到廿六日晨信中的诤吉问题。[32]我们就从诤吉问题入手。有关“诤吉”一事，可参下文对132页之19160907（应系19160708）及135页之19160812罗信（应系19160713，十四日）对“诤吉”问题的梳理。此信谓：“诤吉书始于今晨取到，择定明年三月廿九日，寄上请警收。”《全集》105页之19160818/21（又见《往来》120页，系19160719/22，误，考已见上。廿、廿三）王国维在信中答复第二次诤吉情况：“诤吉书即于次晨交尧香，今尚未来，想明晨当交来”，“前函写成三日，而诤吉书尚未送来（昨云今日有，而今日未到），故未发。”《往来》140页之19160827（廿九）信，王国维又谓：“前日寄诤吉书想已收到。”140页之19160829（八月朔）罗信则谓：“盼来书者数日矣，顷得惠笺，知为诤吉事稽延。”综合上述诸信有关诤吉的前后发展，则此廿六日晨部分，必书于七月。故当系19160824。

129页之19160731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84页，系19160701，是。《全集》编者定此日期的理由是：“《时事新报》1916年7月1日刊登消息有云（阳历六月）二十九日大总统明令宣布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，定期召开国会。札云‘今日阅报，知南方已如愿已偿，大约暂归无事耳’。即指该日报刊的此项消息，是此札书于六月初二日。”此信又谓：“接邮局通知书，以为《殷虚文字待问编》已到，比去取，则《南宗衣钵跋尾》也。”可参上数条的考订。

为清晰起见，对有关《待问编》的前后书信重新排列如下：19160604罗信、19160605罗信、19160607罗信、19160615罗信、19160717（十八夕，应19160618）罗信、19160724（应1916

0625) 罗信、19160731 (应19160701)、19160704/06。只有如此排列,《往来》诸信中有关《待问编》的内容方不互相抵触。

132页之19160807, 误; 又见《全集》114页, 作19160906, 亦误。信中谓: “前日寄一书并《学术丛编》,” 112页之19160707/08信亦谓: “前日寄《丛编》六册。” 则两信当作于同一天, 均有季英太夫人病情。132页信是112页信发走后, 又专为谏吉事而发。则此信当提前, 系为19160708。

135页之19160812罗信, 误。信中谓: “承惠《丛刊》第二册, 谢谢, 并分致诸人矣。小儿谏吉事, 费神至感。但其谏吉书中明言, 大利乃三九月, 小利为二八月, 而所择之月则为十月, 殊不可解。弟与家人意……万不能用。请仍托张君持谏吉书访问李日者, 令其改选, 似不须更询他人也。” 前引《往来》106页之19160627罗信, 是委托王国维请人谏吉, 108页之19160701王信, 谓已经托人。132页之19160807 (上已考, 系19160708) 王国维表示已有谏吉结果: “君羽喜期已由尧香令日者择来, 其在明年十月十九日, 而单中有三、九月大利语, 疑尧香分付未晰。尧香则谓日者云春秋二季均无日可择。盖此种人下笔往往随意矛盾, 是否须另遣他日者一核算, 请示为荷。” 对此结果, 不仅王国维不满意, 就是罗振玉在此信中更不满意。此罗信正是回答王国维是否应再一次谏吉问题的。故此信当书于六月, 系19160713。

240页之19170228罗信两通, 即“二九六”与“二九七”, 落款“初七夕”同, 故系年月日同。同一夕, 罗振玉有两信, 事不可能, 必有一误。疑“二九六”误。“二九六”信谓: “士龙在此间。”《往来》244页19170307罗信谓: “士龙闻阳历初六乃至神户。” 247页19170312罗信谓: “象山在此所议, 毫无所闻。” 则“二九六”罗信当后推一个月, 系为19170329。又, 信中的士龙、象山, 《往来》的审定者罗继祖先生以为均指陆荣廷[33], 但从其他一些记载看, 陆荣廷当时似乎没有去日本, 《郑孝胥日记》1917年3月19日: “陆荣廷来, 余适出门, 未晤。爰苍言, 于康有为处见之。” [34]次日: “过泰安栈晤陆干卿。” 陆之来沪是从香港来的, 随后陆荣廷就途经南京、徐州北上北京去述职了。则信中所谓在日本的“士龙”、“象山”并非指陆荣廷, 而应当是指陆宗舆[35]。

241页之19170303罗信, 误。此信谓: “一旬快晤, 足慰一岁之别。惟临别二日, 情绪益黯然耳。” “快晤”云云, 是指王国维本年春节前后去日本晤罗振玉。《往来》232页之19170206、19170207罗信、19170207诸信均说明王国维在正月十四午时由日本抵达上海。则此信当系19170201。

243页之19170304罗信, 误。此信谓: “蜀士前来谈, 此人脑经较他留学生为细密。”《往来》240页之19170228罗信 (上考, 当系19170329) 谓: “今日蜀士来谈。” 则此信当后推一个月, 系为19170402。《往来》252页有19170402罗信一通, 此两信当书于同一天。

261页之19170530罗信, 误。此信谓: “弟准十四日春日丸行, 计十七当抵沪, 良晤不远, 特此奉闻。” 此信的落款是“初十日”。而《郑孝胥日记》1917年5月18日记载: “夜, 衡甫又来, 言哈同作仓圣会, 以冯梦华为会长, 贻书等为会员。余曰, 闻罗书蕴亦在会中。” [36]1917年5月31日又载: “过打铁滨吉益里访罗叔蕴, 遇王国维于座。” [37]则此信当提前一个月, 系19170430。

284页之19170825信, 误; 此信又见《全集》200页, 系为19170726, 是。其理由, 《全集》

编者已说得十分清楚：“又云‘此间天气入伏乃不甚热’，丁巳年五月廿九日入伏，则此札当书于六月。”又，此信涉及王国维研究《切韵》与《唐韵》，王国维时正在抄音韵方面的材料，是其研究的开始阶段。此信正与19170723、19170804、19170810、19170814、19170827诸信有关讨论音韵的内容合。

289页之19170908，误。此信落款日期是廿三日，查年历当是19170909。

323页之1917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237页，系19180104，是。

337页之19180128罗信，误。此信与338页之19180130罗信（当系19180228）密切关联，两信均提及乙老的画卷。又，341页之19180205（当系19180306）亦提及“沈画五卷”。此信又谓：“席少卿处有日币四千元，请范二先生令渠送呈，到祈代收。”340页19180204（当系19180305）则谓：“席少卿款已取到矣。”则两信款事密合；又，信中有秦剑拓本事，此两信亦合。依据对338页罗信及340页19180204的考订，则此信当系19180226。

338页之19180129罗信，误。此信与340页之19180204信“景叔书”相合，则依据对340页信的考订，此信当系19180227。

338页之19180130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新得雍库钥拓本与雒阳铜勺，同奉寄。”这与340页之19180204信“汉钥并铜勺拓本”事相合。依据对337页19180128罗信、338页之19180129罗信及340页19180130三信的考订，此信当系19180228。

339页之19170203罗信，此信系年当是手民之误，此信在目录中作19180203，当以目录所排为是。

340页之19180204，误。此信谓：“此间入春以后，自本月十六日后又复多雨。”立春是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，此信书于“二十三日”，当是正月。故断定此信当系19180305。此信日期之确定，则337页、338页三封罗信也必然确定。

341页之19180205，误。此信提及“凤老世兄作《曹真碑跋》”，与340页之19180205信正相合；此信又谓：“苦雨连旬，甚为闷损。”355页之19180314信就交代了当时上海的雨情：“此间久雨，几及一旬，至二十八始放晴。”故此信书于正月，当系19180306。

341页之19180206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238页，系19180107，是。《全集》对此信的考订理由可信，文繁不引。兹再加二证：一、信中谓：“前日往温州之普济轮船在吴淞外失事，死者二三百人，徐班侯与其眷属皆罹其祸，可谓巨矣”，据记载，普济轮失事是1918年1月5日黎明三时[38]。二、信中又谓：“家中病人已全愈，惟五小儿尚未复原。内人齿痛未断跟，齿尚未拔，不敢轻试。惟闻徐紫峰已老，不临证，不知其弟子有替者否，须再访之”，这一内容与《往来》329页之19180111王信“现在拟打听徐紫峰住处及出诊否，牙愈则一切皆愈矣”，333页之19180119罗信“嫂夫人确是牙痛，至拔牙但能诣其家，因诸器械，不能全携带也。若告以不须器械而勉应人请或令徒弟等出诊，不如往医为便”的内容相接。

342页之19180207，误。此信谓：“苦雨仍未已。”则据355页之19180314信，可断定此信书于正月，当系19180308。

344页之19180209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张早入都，大树求退。”意指北京政局的变化，则

此信当书于正月，系19180310。

344页之19180209，误。《往来》以信中有“康成之子从百粤归”为依据，并有注释谓：郑垂在1918年2月4日自广西抵达上海，故定此信书于十二月，误。信中谓：“阴雨，数日不出。”且在王国维的其他信中也没有说是年前阴雨的记载，王国维既然数日不出，郑垂的信息是如何得来的？信中又谓：“今日诣寐叟谈”，此信落款为二十八日。350页之19180314信谓：“二十八日赴寐处一谈”。两信记载相合，则此信当书于正月，应系19180310。

345页之19180213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241页，系19180115，是。《全集》编者的考证不复引，以下再从《往来》诸信中进一步看此信排为十二月是否合适。此信谓：“内人之疾，近日齿痛头痛均不发，而每晚恶寒兼发微热，且疲困异常，乃疑林洞省之言为不可信。今日往佐佐木处，则谓系肺炎初期（云产后易起肺炎），现可治愈（系左肺有病，所谓肺尖加答儿也）”，这一内容与332页之19180118王信：“内人之疾，昨日往佐佐木处复诊。前日系其助手所诊，昨日佐佐木自诊，则云系神经衰弱与痿麻质斯（日文音译，中文为“风湿性关节炎”。——整理者注）二病，其影响延及肝胃，并非肺炎。闻之大为放心”；335页之19180124罗信：“嫂夫人服药后如何？肺尖加答儿，乃肺炎之先声，早治必愈，去肺结核尚远。盖肺尖加答儿，失治即成肺炎，慢性肺炎即成肺结核也。请嫂夫人不可闻医言而过虑，亦不可玩病而致深入，总以加意调摄诊治，痊愈乃停药为宜。不审以为何如”；336页之19180126罗信：“嫂夫人复诊，非肺炎，家人欢慰。但果系神经衰弱与痿麻空斯二病，则毫无关系于性命，真善于浴温泉处暖地，否则须久延时局。公试服佐佐木方有效与否，断其是非，弟意佐佐木临证甚多，其言可信，似不宜屡易医也。神经衰弱以静养为宜，弟意此病殆得于诸郎之病时，卒然得之，似不难速愈，”336页之19180127王信：“前日君楚到后寄一书，想达左右。嗣后共接二书，敬悉一切。内人之疾承府上垂念，甚感。现服佐佐木药已十日，小寒热已不复作，身体疼痛亦愈，胃亦渐佳，不久当可全愈，尚拟往复一次。此病殆以痛风为主，而身体因之衰弱，主病既去，恢复自易也，”338页之19180129罗信：“奉到十二日手书，敬悉。嫂夫人服佐佐木药甚有效，食其药热一次，每日之小寒热遂已。此病已发出，不至延为慢性，可喜可慰。胃尚不佳，宜食易消化之物”，339页之19170203罗信：“小儿返东，得手书……嫂夫人日渐就痊，至慰至慰，家人亦为忻喜”，上述各信对王夫人的病情可谓一贯，若依《往来》将此信排入正月，则与上述各信构成极大的冲突，故《往来》对此信的排列有误，此信书于十二月初三。

348页之19180216（初六日）罗信，此信甚有问题，信由两大部分构成，一部分是初六所写内容及附“华少云”至“此人元旦抵沪也”，此一部分不误；另一部分，姑且称为19180216乙，是“正作复函。顷得初三日手教。知嫂夫人已延佐佐木诊视，定为肺病初期”以下全部，未署日期，此一大部分大误。19180216乙的内容是罗振玉接到王国维（十二月）初三日信的详细回复，具体就无须再抄录。自十二月初三，王夫人由佐佐木医生诊治后，日渐好转，到十二月中下旬，就已经为即将来临的新年而忙碌了，致使病情有反复，王国维致罗振玉19180208信中谓：“内人自中旬末发寒热二次，至下旬渐快。然每年例行岁事，不肯将就，又每事欲亲自料理，而神经既弱，肝火易升，故昨又复不快。总须换新岁宽闲，才能调息。”但新年的劳累似乎不至于使王夫人到佐佐木那里看病只是初诊。若以《往来》将初三信与19180216乙信排在正月，不仅与前面的信件内容上相矛盾，而且在罗、王的通信中也不可能有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若将初三信与19180216乙信排入十二月，不仅不会有矛盾，且正与前后各信内容密合。总之，19180216乙无论如何都不能排到正月里，那么《往来》在此又是如何致误的？19180216乙是一件残信，上无开始，下无落款，致误的可能有原信失散，仅余这份

残余，后人将它粘连错简致误，也许是整理者整理过程中致误。19180216乙既然是罗振玉接王国维初三信后的迅速回复，它的具体日期应是何时？这也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，我认为此19180216乙不会晚于十二月十二日的19180124罗信，极有可能就是初十或十一日写的。这从罗振玉的19180124（十二日）的信中也能得到一些证据，19180124罗信谓“前函想达左右”，这说明在之前有一信，而19180124就是紧接19180216乙信继续响应王国维初三信的。罗振玉对王国维家的情况极为关心，似不可能相隔多日再写19180124信，再从当时二人的信件速度上看，快者五天，慢者月余，暂定此19180216乙为19180122。

351页之19180223罗信，此信甚有问题。信由两部分构成，前一部分至落款“十三夕”，后一部分为“再……”以后全部，且亦有落款“十六日”，此系一残札，后人整理误粘于此。十三夕信谓“去冬”、“今年”，说明十三夕部分书于新年之后。十六日信中谓：“一月初或为谒陵之行，”表明此部分决不会在正月之中，当书于正月之前。则此十六日部分当书于上年的十二月。故此信的后一部分当系19180128。

353页之19180305，误。此信不署日期，整理者特加“前后”字样以示无奈。此信告诉罗振玉高邮二王后人及其家藏情况：“惟文简小集及文肃以下三世行状则各房尚有数部”，故罗振玉在接此信的355页之19180309回复信中说：“承示《王文简集》及文肃三世行状尚有存者，为之奇快。”此两信之间仅间隔4天，当时正常的中日通邮速度似不当如此之快。王国维在此信中又提及上海的天气：“此间上元左右甚暖，最高温度为六十五度；昨今小雪，又降至四十度左右矣。”据《郑孝胥日记》记载，1918年2月28日：“夜，雪。”3月1日又载：“雪景甚佳。”[39]则此信当书于正月十九日（3月1日），当系19180301。

365页之19180409，误。此信内容与332页之19180117罗信、333页之19180119罗信等相关，当以王宇等《王国维未刊书札（二）》的考释为是，系19180209。

404页之19180823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272页，系19180921，是。《全集》以日本米价风潮定此信时间，是也。此信谓：“《仓颉篇》重辑本昨日已写毕”，此内容与《往来》409页之19180903罗信问“尊辑《仓颉篇》能早印行否”、415页之19180925王信“近写《仓颉》毕”等内容也完全吻合。此信又谓：“昨况夔笙所得元本《吏事指南》八卷，”《往来》406页之19180825信：“今日晤况夔笙，自北京来……在都购得元本《吏事指南》一书，元本元印，云系《官场备览》之类，渠以百元得之，至沪或可售二百元云云。书因价未付清，未携来，将来当就观之，恐有好材料也”，两信于《吏事指南》事正矛盾，故《往来》的排序有误，《全集》正确。

422页之19181110罗信，误。此信落款“初七”，信中谓：“会晤不远”、“此间情事，外人不能尽知……弟亦亟欲归国，可常领教益”。而《郑孝胥日记》1918年11月9日记载：“罗叔言来访，不遇，留所著《雪堂校刊群书叙录》及《六朝墓志菁英二编》为赠。”[40]则此信当提前一个月，与419页之19181011罗信书于同一天，系19181011。

422页之19181114前后罗信，误。此信无落款，谓：“今日下午到此，此次留二三日耳。”419页之19181011罗信谓：“现拟返国一行，先取道沪上，与公尚可作三日谈，欲言甚多也。已定諏访丸舱位，乃阳历廿一日由神户启行（即我十七，约廿一日当到沪）。现船小舱难，非二三星期前预定不可也。”如此，罗振玉当在10月24日抵沪，则此信当系19181024。

433页之1918十二日信，此为残信，前半部分遗失，此信谓：“今日《申报》中登蔡吉逢致

红十字会电，知君美、季英已入山中，……户口查毕，想竣事不难”。查《申报》，1918年5月21日有《放赈员报告涞县灾情》之记载，正是蔡吉逢致红十字会电。[41]有蔡吉逢见《往来》366页之19180425罗信，罗在信中说：“弟今日由保返京，振事已略调查，蔡吉逢人极精干，预想此次成绩必佳，小儿等留保，后日即发着手查放矣”，370页之19180526罗信：“振事幸得实际，报纸所云，不理可耳”，则此十二日札当书于四月，系为19180521。

433页之1918十三日信，此为残信，前半部分遗失，此信谓：“叟出示贵州汉石刻”，此一内容与424页之19181122王信“十三日寄一函……昨日晤寐叟，欲借其河平夜郎石刻伏石印”、19181127罗信“贵州汉刻，弟所未见”正吻合，则此信当系19181116。

485页之19200114罗信，误。罗振玉在信中谓：“上月廿七日赴都，吊梁文忠，卅日返津，”梁鼎芬去世在1920年1月3日（十一月十三日），信作于“廿四夕”，应是十二月廿四日，则此信当是19200213。

490页之192002上旬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300页，系1919，亦误。当系192002中旬，考订见《全集》部分。

491页之19200215，疑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455页之廿六日信，未定年月。此为残信，前半部分遗失，此信谓：“补一则，未识尊稿已刊定否？此卷为徐山民旧藏，有袁棠、梁山舟、顾元熙诸人跋。维亦跋数语，谓卷中诗之先后以齿为序……”《往来》503页之19200721罗信：“顷又奉手毕，并承抄示俟斋佚文佚诗，已补入年谱”，似与此信相合，则此信当为19200711。当时正值直皖战争时期，邮件可能受阻，沪津通邮竟间隔10天，不可能王国维在2月15日发信后，罗振玉到7月21日才刚收到。故此信定为7月11日。

497页之19200602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承示素老之病已愈，为之称快。”据《郑孝胥日记》记载，1920年8月16日，“至来远公司，晤蒋孟莘、曹君直、孙隘盒，以青岛二等来回票四张、三等票一张与隘盒，钞九十元托带与吉甫。”[42]这是曹君直等人即将去青岛为升允看病。9月16日又载：“曹君直、孙隘庵来，自青岛初归，云升吉甫病已全愈。”[43]信中又谓：“北省奇灾，哀鸿嗷嗷，惨不忍睹。”而《郑孝胥日记》1920年9月17日记载：“北方大旱，直、晋、齐、豫、陕，赤地千里，人相食。”[44]信中诸事与日记相合，则此信当书于八月，系为19200927。

500页之19200630罗信，误。此信落款残，仅有“月望”，“月”前之字大约模糊，不能录出。信中谓：“直振收条已由一山寄来，费神至感。银币十圆奉完，祈惠收。”505页之19200813罗信谓：“一山有来函，言其乡风潮为灾，闻之悯恻……兹有书致一山兄，并求垫付十元，俟季英返沪奉完不误。”此赈灾事似当前后相关。信中又谓：“奉新有先皖后秦陇之说。”奉新指张勋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1920年9月9日记载：“张勋部将张文生、陈德修、殷恭先、白宝山等会议于徐州，合词电致北京，求以张勋督皖。”9月12日又载：“报言，张勋将为陕甘巡阅使。”[45]则此信当书于八月，系为19200926。

507页之19201203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乙老病已霍然，至慰至慰。”沈曾植生病一事，发生在十一月，《郑孝胥日记》1920年12月28日记载：“闻沈子培病，走往视之。”[46]信中又谓：“弟南中之行，捐到约三万元。”说明此前罗振玉曾经到过上海，罗振玉至上海亦见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20年12月11日，“夜，罗叔蕴来，谈京旗死亡之状；已于北京设京旗生计维持会，欲设分会于上海，附于广仁堂，邀余为发起人。”12日又载：“过罗叔蕴，晤王

定庵及樊君。”13日载：“夜，罗叔言来，以苏路、浙路所收股本北京中、交钞票八百八十元捐入京旗生计维持会。”[47]则此罗信当书于十一月，系为19210102。

508页之19201211罗信，误。上已说明在1920年12月11日，罗振玉已经至上海，则此信之系年就于理不通。信中谓：“新居书箱积如山阜，大约非两月之期不得部署安贴也。”506页之19201101罗信谓：“新居书卷狼藉，尚未暇理，大约至春间方能着手也。”罗振玉刚刚移居新居。则此信当提前一个月，系为19201111。

508页之19201213罗信，误。507页之19201203罗信（当系19210102）谓：“弟南中之行，捐到约三万元，连弟所捐，得五万元，不为甚少。”此信则谓：“舍中款项，弟所捐募约七万余元。”则此信依据对507页罗信之考，当系19210112。

510页之19201223罗信，误。罗振玉在12月曾至上海。此信系年与前后数信不相关。信中谓：“承赐扇面，拜谢拜谢。三世兄闻已就愈，至慰。五小儿忽患心脏病，初颇危险，近稍平泰。”赠送扇面，意味着夏季将至或已至。513页之19210321罗信：“闻小女言，小令郎在沪患恙，迩来不审愈否？”515页之19210609罗信：“迩来家人次第生病。”则此信当书于三月或四月，暂系为19210421。

512页之19210317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小女及伯深意见，弟已问明，小女意谓春间拟返沪侍奉。”而513页之19210321罗信表明罗氏女早已在沪，两信仅仅相距4天，有矛盾。信中又谓：“因奉帅拨地十余万亩，在奉属辽源州。”《郑孝胥日记》1921年2月14日记载：“罗叔蕴来电，云现已商办旗民移垦黑龙江，请季高助力。”[48]则此信当提前一个月，系为19210215。

529页之19220418，误，此信又见《全集》321页，作19220320，亦误。考已见《全集》部分，当系19220518。兹就《往来》对此信进一步考订，信中对蒋孟莘为陈松山贖款积极募集一事谓：“此次孟莘出力，全因乙老一言与公一函，公将来可作书谢之，或赠以篆隶楹帖，则更喜也。”531页之19220503罗信（当系19220602）则回应：“孟莘兄为陈黄门事尽力，至可佩，祈先代致歉意，随后函谢。”则此信必书于四月。

531页之19220503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素公在岛，待款南中，方能启行，晤一山太史时，幸一言之。”事为升允由青岛迁移至天津谋划迁移费用。《往来》538页之19220702 / 03信谓：“素款，刘澄翁三百元，苏厂二百元，陈筱石与乙翁各一百元，而翰岁助之五百元亦同时寄出，现已得千二百元，……此一山之力。一于前日告维，尽可人意。”《郑孝胥日记》亦有数日记载其事，1922年5月12日：“章一山出示升吉甫信，言欲移居天津，而无移家之资。”5月22日，“章一山来，欲为升吉甫鸠资移居天津。”6月2日：“章一山来，为升吉甫集移居天津之资，刘澂如三百元，沈子培一百元，陈小石一百元，余亦送二百元。”6月4日又载：“过章一山，以二百元托寄升吉甫。”[49]则罗振玉此信当书于五月，系为19220602。

546页之19220929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329页，系年月同，亦误。此信落款为“初九日”。《全集》的考证理由是：“札云‘乙老患症愈后，近日又苦小便不通……’。据《沈寐叟年谱》壬戌年有云‘七月十五日复病，初似症，至八月十五日又患癰闭。’则此札书于壬戌八月。”《全集》的考证理由没有细辨问题的前后次序，既然沈在八月十五后才患癰闭，何以王国维在八月初九就已经预先知道病情了，这于理显然不通。《往来》547页之192

2109（上考，当系19221107）信谓：“乙老月初以后，因大便稍用力，遂患小便不通，西医用手术通之。”与此信密切相连。则此信当书于九月，系为19221028。

547页之19221009，误。信中谓：“息侯南来，曾晤及。”《郑孝胥日记》1922年10月22日记载：“夜，赴刘翰怡之约，晤金息侯、章一山、刘聚卿……”[50]《郑孝胥日记》前此数日并无金梁的记载。则此信当后推一个月，系为19221107。

547页之19221016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今日见让于，言连日内务府放手裁人，毫无体恤，深可忧也。日前曾有数函托商生携奉，商到宁，暂不到沪。”540页之19220726罗信：“裁员一节，闻上驷銮仪裁十之九，内官裁半，卫士裁十之六，内侍尚未着手，即日执行。”两信均有关于“贡父”（指刘廷琛）之评论，文繁不引。则547页信当在后信之前，当书于五月，系为19220720。

548页之19221023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乃昨遣小儿入都，有事晤息侯，息侯告小儿……”说明金梁至少在22日时在北京。然据上引《郑孝胥日记》1922年10月22日的记载，说明金梁10月22日夜尚在上海，这与此信的系时有矛盾。金梁没有分身术，同时出现在北京和上海，就是假定他早上在北京会见罗振玉公子，晚上也不会在上海，当时尚无如此快捷的火车。则此信当后推一个月，系为19221122。

551页之19221130罗信（十二夕），误。同页有编号相同的另一罗信（十二日），虽然同日多信的情况多有，但此信系此恐不妥。552页之19221210罗信谓：“松老荷孟莘兄倾助，感佩无似，汇款想不日可到，请先代致谢。”而此信则谓：“孟莘未来，前书未作答，款亦未汇。此事但有置之，不欲再琐琐矣。”表明此信当在552页信之后。信中又谓：“乙老饰终之礼至渥，治丧银至二千元，乃亲王例也。易名之典，虽未知如何，然有‘品端学邃、志虑忠纯’语，则隐寓忠端二字矣。此事困难万分，今得如此者，乃特出宸衷，乙丈无憾矣。”清室赐沈曾植丧后事，其曲折原委见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22年12月15日记载：“朱稷臣来，示琴初与仁先、絜先书，云：子培请谥事，摄政王不欲：宜令上海诸公陈小石、朱古微、王聘三及余等作公函与师傅请之。”[51]则此信当书于十月，系为19221229。

552页之19221212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神田知己接见。”神田在上海的踪迹可见于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23年1月13日记载：“日本神田喜一郎……来访。”1月21日又载：“神田鬯盒来。”[52]信中又谓：“弟俟翰怡过此，即南下弔乙丈之丧，翰怡在京待恩赏，现虽已下，此人性缓，恐尚有三五日乃能来此，已约定住寒斋数日，大约初四五或能成行也。”551页之19221130罗信（上考，当系19221229）谓：“弟欲南来一弔，现筹措行资。翰怡等恐望间乃能到此，若与偕行，当在月之下旬也，此行拟不过留二三日。”罗振玉遂在十二月初至上海，《郑孝胥日记》1923年1月25日：“罗叔言、章一山、孙惠敷来，叔言作《封建弭乱私议》一篇。”1月27日：“与叔用、一山、叔伊公宴伯严、叔言，坐中十二人。”1月29日：“过罗叔蕴，已行；与王静安谈久之。”[53]则此信书于十一月，系为19230110。

554页之192301初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在沪适馆授餐，感谢匪可言喻。”上引《郑孝胥日记》表明罗振玉至少在1月29日已经离开上海。则此信当系为192302初。

556页之19230122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初三入都，次夕返津。乙丈遗折，重重阻滞，胡晴翁至为出力，然其结果究不知如何。”依据上对552页19221212罗信（当系19230110）的考订，此信当提前一月，当书于十一月，系为19221223。

591页之192309下旬罗信，疑误。信中谓：“胡、温过此入都，素未见，亦未来弟处，甚奇。”胡当指胡嗣瑗。《郑孝胥日记》1923年10月1日记载：“胡琴初来。”[54]则胡嗣瑗10月1日尚在上海。则此信当系为192310上旬。

597页之19231121十四日信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453页，未定年月。此信谓“蒋藏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古本刊本各一卷，皆林天骏书，”这与1923年前后各信没有联系。此信是王国维从天津回京后，于《往来》652页之19260122（此信又见《全集》425页，系1925，未定月日。）信中告诉罗振玉“顷检蒋氏书目底稿，有闽人林天骏所书《大学古本》、《中庸古本》各一卷，系嘉靖中刊本，后有林吉人手跋，谓天骏字守良，嘉靖中官胶州知州”后，罗振玉于654页之19260124信中要求“古文古本《大学》刊本，乞示大略，弟欲作跋也”后的回复。此信又谓：“齿痛想已霍然。文甚不易作，我辈此次立言，须泯去痕迹，方为有效，故鄙意见人故不可，论事亦著行迹，故以论心为要。但一时不易著手，须以一二月为期，其时亦当可以进言之机矣。请告素帅稍缓之（去岁代撰二文皆稍见效，盖得其机也，此时拟暂沉默为善）。”故此信当书于十二月，系19260127。

597页之19231208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弟意素相能一入对，详陈高密与日磾之居心”。素相指升允，高密指郑孝胥，日磾指金梁，又谓：“近半月愤懑已极，若竟无可挽救，弟当作自了汉，不复闻天下事矣。”此信的事件，当指郑孝胥正在北京大有动作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，郑孝胥入京，是在1924年初，一次是1月8日到京，1月25日离京上返回上海的火车；春节过后，于2月14日即正月初十再至京。郑孝胥2月14日入京后，溥仪于2月16日命其管理内务府，并以金梁为助。[55]598页之19231210罗信（当系192404上旬）谓：“弟初五晨车入都，一见素相。”素相在北京，也见于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24年4月10日记载：“升吉甫来。”[56]此信当写于三月初一，系19240404。

598页之19231210罗信，误。此信不署日期，信中谓：“式之六十，弟意莫如由公向孟莘索大著一部送之，作为寿礼。渠必甚喜也。”章钰生于同治四年（乙丑，1865），其六十生日当在甲子年春节（1924年2月5日）后。而以此信的排列时间，此时尚是癸亥年十一月初三，则此信的打算也太早了。再从王国维的《观堂集林》出版的及王国维分赠他人情况看，王国维在1923年12月6日前收到《观堂集林》的第一份样本[57]，12月30日又收到一部《观堂集林》[58]，1924年1月17日王国维向蒋汝藻列出了分赠给在北京19人的名单[59]，1月25日才罗振玉收到王国维的赠书[60]。又，此信与《往来》中的前后诸信，密切相连，依据前考之597页之19231208罗信（应19240305），及下考598页之19231211罗信（应19240407），则此信系192404上旬。

598页之19231211罗信，误。此信书于初四，谓：“弟初六晨车入都”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记载，1924年4月9日即三月初六日，“息侯、罗书蕴同来”[61]。则此信书于三月，当系19240407。

598页之19231215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在都奉扰，至谢。昨在银行”。罗振玉在三月初六入都，在初八已经回天津。此信作于初八夕，当系19240411。

599页之19231217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高密、日磾之交，竟不可测，但不审素老与高密何言”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记载，1924年4月10日，“升吉甫来”，4月11日，“楫先邀饭于庆和堂，升吉甫、弢庵、艾卿、寿民、王静安在坐”。[62]则此信当系19240413。

599页之192312中旬罗信，误。此信不系日期，依据600页之19231223罗信（当系19240419，考见下），此两信均提及淮生入京事，599页此信谓“淮生不日入都”，600页信则谓“淮生（今日入都）”。则此599页信必书于600页信之前，此信当系192404中旬。

600页之19231223罗信，误。此信落款为“十六夕”，又谓：“连日家人盼望小女分娩消息，几至望眼欲穿。顷奉到惠书，忻悉昨日分娩，大小平安。”598页之19231210（上已考，当系19240406）罗信：“内子初六早车入都，由弟送诣尊府。”罗振玉送夫人到王国维家中，是为了照顾罗振玉女儿即将生产之事。此信当系19240419。

600页之19231225罗信，误。此信与同页之19231223罗信（当系19240419），均提及王国维“与太真之文”一事，则此两信当前后相接。故此信当系19240421。

601页之19231225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书方付邮，而高密忽至……高密来见干木。”高密指郑孝胥，干木指段祺瑞。郑孝胥去天津见段祺瑞一事，据《郑孝胥日记》记载，是在1924年4月20日，即农历三月十七，次日，郑孝胥“复过罗书蕴，谈至十点，坐中晤商云汀”。[63]与此信正合。信中又谓：“宝意明晨入都。”宝意指商衍瀛，字云汀。与《郑孝胥日记》记载亦合。则此信当系19240421。

601页之19231228罗信，误。此信内有“淮生出示石经”与罗夫人在王国维府事，与上文已考600页之罗信密连，当系19240424。

601页之19231231罗信，误。此信内有罗夫人由北京返回天津事。与上文已考600页及601页诸罗信密连，当系19240427。

602页之1923十一日信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453页“十一日”，不出年月。此信谓：“今日拟送凤老《历志》稿至丁辅之处……纬公已赴淮，如须购纸须俟纬归再付矣。汇款尚未到。今晨晤景叔询哈园近状，据云一山教科书一局暗中已有取消之意，特一山已聘定，或以敷衍了之。”信中的“凤老《历志》”指柯绍忞的《国史时宪志》。351页之19180223罗信“柯凤老书来，并寄其所撰《国史时宪志》。今世为天算之学者，凤老以外，则劳劳山丈，他无能为是者。其书四册，拟为授梓以付之”，373页之19180605罗信“《雪堂校刻群书叙录》……今日上卷已成，邮奉，祈交丁君照以前定式，用仿宋活字排印五百部……此稿祈发印并请问以何日可印成（此书成，再印《时宪志》）”，398页之19180730王信：“凤老书已付与图画，图约百余枚，已画成一本”。由上述诸信可知，602页“十一日”信必在1918年的2月23日至7月30日之间。信中的纬公指范兆经。384页之19180626王信：“印纸已由纬公处交付”，377页之19180616/17王信：“纬公感冒已愈，纸料想亦不日可购矣”，372页之19180602罗信问：“纬君已返沪否？”373页之19180604/05王信回复：“纬君全眷已于昨日到沪”。则“十一日”信可断定在纬公于6月3日返沪之前。又，364页之19180419罗信“握晤至快，别后车行两日”，则柯著极有可能在罗、王相会时，由罗振玉交给王国维的。367页之19180517罗信，已说明罗振玉于四月初八已在返回日本的船上，则“十一日”信极可能书于四月。再证之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18年5月11日记载：“叶蒲孙来，谈哈同、姬佛陀、俞志韶、冯梦华、章一山之状。日前，为耆老会，行乡饮酒礼，以冯为宾，向姬拜揖无算，立俟礼成乃罢去。俞尤谄媚哈氏及其妻。章受姬委任编教科书，可资捧腹。”[64]则此信定书于四月，系为19180520。

602页之19240102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日磾之奉新命，果能遂远之否（倘就此职，亦必闹

笑话)？”“日磾之奉新命”一事，指1924年4月27日溥仪任命金梁为热河办理皇产大臣事[65]。此信当系19240429。

605页之192401中句，误。此信又见《全集》380页，系192401，亦误。此信不署日期，信中谓：“高密于此事已栽一大跟兜，稍有人心必须自退以谢天下，加以天怒人怨，恐不久即不能站脚。日磾亦必随之而倒……高密减政之策，本不期实行，但以掩人耳目，其大计划既败，则亦自必求去”。郑孝胥的“大计划”是其清查皇室财产以缩减开支事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1924年5月5日记载：“上召见，谕云：‘洵、涛言：程克密呈曹锟，请查皇室财产：已派冯玉祥、薛笃弼、聂宪藩等。且言：惟罢郑孝胥而使赵尔巽为内务府大臣，庶可少安。’”[66]5月10日又载：“召见，陈不能整顿之状，求去，上不许。”[67]此信当写于农历四月初七以后。信又提及：“库书一项，将来只有公开一法，以免攘夺，此则高密所断送者也。”此指当时商务印书馆拟印《四库全书》事，此事可见于《郑孝胥日记》[68]。表明此信绝不书于1月，当书于印书计划之后。此信系192405中旬以后。

607页之19240205，误；此信又见《全集》389页，系时同，亦误。《全集》以信中有“节赏已下，明晨须入内谢恩”为据，认为是指春节。可是春节前王国维罗振玉并没有见面，因此，信中所谓的“顷别后回家”就无所指。《全集》与《往来》对此信的排列显然不能解释信中的信息。信中又谓：“将尊文与维所拟一文稿令冯友送呈，请与素师一酌，缮后可令冯友带回，则初四日即可上矣。”620页之19240505罗信（当系19240603，考见下）则谓：“别后再拟入奏，方于车中得腹稿，……作函间，冯友来，奉到大稿并来示，即转素相。”与此信内容相合。则此信当书于五月。再从信中的“节后”云云来看，也不应当是春节，不然溥仪的春节也不得安宁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1924年5月27日记载：“上召见，示午节赏赍单，共用三万余元。”5月29日，“上召见，与内务府各大臣上说贴，同辞端午节恩赏。”[69]看来，郑孝胥等人没有辞掉皇上的恩赏。则此信系为19240602。

610页之19240304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大跋收到，已转汴矣。”此跋一事与614页之19240425罗信（当系19240325，考见下）中“承寄大跋，拜领。汴中古器，现方修缮”相合。据对614页19240425罗信的考订，则610页此信当系为19240402。

610页之19240322，误。此信署“初七日”，谓“维自廿八日稍有咳嗽，致月初逆患感冒，身热、头痛、骨酸，至初五日始渐向愈。”查年历当系19240311。又，《全集》391页之19240311致蒋汝藻信谓：“弟近感冒七八日，今日始愈”，与此信正合。

611页之19240405罗信，误。此信署“初二日”，信中谓“前渠来津”，指郑孝胥于三月十七日来天津[70]，则此信当书于四月，系19240505。

612页之19240406罗信，误。此信依据19240405罗信（应系19240505），当书于四月初三，系19240506。

612页之19240408罗信，误。此信署“初五日”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，至少在4月9日（初六）罗振玉就已在北京[71]。上已考之598页19231211罗信（当系19240407）谓：“弟初六晨车入都。”则此信排入三月，显然不合适。至四月初六，罗振玉又至北京，[72]则此信也非四月之事。信中谓：“以一切不顾转战而前之人，乃乞怜于军阀，何其陋也”，此或指郑孝胥与吴佩孚的联系；又谓：“息谓连日间博物馆亦示人以怯。”“弟此次不欲献璞（此次民国来文[73]，断不可轻遽作答，要紧要紧）。”则此信似当书于九月，暂系为19240100

612页之19240410罗信，误。此信署“初七夕”。据《郑孝胥日记》，4月9日，罗振玉就在北京[74]，显然没有写信的必要。信中谓：“库书付印，欲携至沪。”《郑孝胥日记》1924年2月24日记载：“孙伯恒约至福来旅社午餐，傅沅叔、梦旦皆在：谈《四库》事，昨已晤绍越千，与国民政府交涉，由商务自办，径请保护并专车运送。”[75]信中又问：“奉示知尊体小极，不审健复否？”与610页之19240322（当系19240311）王信相合。则此信当书于二月，系为19240311。

613页之19240413罗信，误。此信谓：“别后不知有近闻否？叔炳归，述大作之概要，仁勇至佩。惟内中两行借款一节，似不可叙入。因此事与上公有关，……弟意此稿先与上公一商，俾内外并进，庶有裨益。”此处之王国维的“大作”当指王国维上书溥仪事。此信与同页之两封19240414罗信（当系19240514）、614页之19240417罗信（当系19250517）、615页之19240424（当系19240524）诸信，均提到了王国维的“大稿”。“别后”云云，当指罗振玉在四月初六去过北京[76]。且615页19240424信又见《全集》，在《全集》部分已考知，当系19240524。615页信王国维见“上公”后，谓“出示文稿，渠谓此时无用，反令后日不能进言，须俟节后再看光景。”王国维以文稿就商于“上公”，正是按照罗振玉的意见行事。则此613页信书于四月，当系19240513。

613页之19240414两封罗信，误。此两信书于同一天。依据对613页之19240413罗信（当系19240513）的考证，当系19240514。

614页之19240417罗信。误。依据对613页之19240413罗信（当系19240513）的考证，当系19240517。

614页之19240424罗信，误。此信提及：“尊体已健复。”此指王国维正月二十八日以来生病，610页之19240322（当系19240311，上已考），正是王国维告诉罗振玉生病情况。则此信书于廿一日，当是二月，当系为19240325。

615页至619页六封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，均见《全集》，且在《全集》部分已考，兹不赘。与此数信密切相连的罗振玉诸信也应推后一个月，亦无须细考。616页之19240425罗信，误，当系19240525。618页之19240429罗信，误，当系19240529。619页之19240430罗信，误，当系19240530。

620页之19240505罗信，误。此信也提及了王国维的“大稿”，且谓“别后”云云。此一“别后”，当指王国维的孙女于廿二日殇去后，616页之19240425（前已考，当系19240525）王国维谓：“令媛发热，系身体劳倦，医生云愈后须多服补血之剂云云”。罗振玉随后至王国维府上，将女儿于廿四日接回天津，王国维在617页之19240428（前已考，当系19240528）信中说：“昨晚想与令媛等安抵津寓矣。”则此信之落款“初二”当在五月，此信当系19240603。

621页之19240505罗信，误。此信与620页之19240505信书于同一天，依据对前一信的考订，则此信系19240603。

622页之19240521，误。信中谓：“高密大约开去本缺，仍留行走，已内定矣。”《郑孝胥

日记》1924年6月25日记载：“奏请开缺，即日奉上谕：‘……著开去总理内务府大臣之缺，仍在懋勤殿行走……’”则此信当书于五月，系为19240619。

624页之19240528罗信，误。罗振玉在此信中，对王国维不代他上递呈文一事表示了不满：“拙著进呈事，公既以为当避嫌……”在621页之19240505（当系19240603）罗信中，罗振玉拟出呈文后送给王国维，要求：“公进呈以后，请示知。”故此信当系19240626。

632页之19240827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此次内府查档案，已得二三百器……我之进用，深得荣文忠公之力。”表明此信必书于罗振玉出任清遗室懋勤殿行走之后。[77]罗振玉受职是发生在1924年9月2日，634页之19240902罗信谓：“顷得息侯传达谕旨，恭悉添派懋勤殿行走。”罗振玉到任是在9月6日，635页之19240905罗信：“弟明晨入都。”则此信当书于八月，因为至九月间，北方政局大变，恐怕罗振玉等人已经没有查档案的心情了。则此信系为19240925。

635页之19240909罗信，误。信的内容有王国维“致马沈书”事[78]及天津水灾事。634页之19240905罗信谓：“弟明晨入都。……弟以后供职，尚有商酌之处，自以住尊处为便。”即罗振玉在9月6日至京，并住在王国维府中。《郑孝胥日记》1924年9月8日记载：“过罗叔蕴、金息侯、曹瓌衡。”9月9日又载：“罗叔蕴、王静安来。”[79]既然罗振玉在9月9日和王国维在一起，罗振玉就没有写信以交流的的必要，故断定此信所系日期必误。631页之19240730罗信：“水警亦诚日有所闻，非全出诳语也。”631页之19240731王国维信谓：“连日阅报，知津埠水势亦至岌岌，不知连日堵御效果如何？……内部条例未见，殆本有所为而作，但于各团体及私家藏古器古籍并有干涉，故各方面无不反对。”王国维“致马沈书”就是其中的反对意见之一。632页之19240804罗信谓：“此间连日风雨，杨柳青子牙河皆决，此间目前似稍纾，然为日方长，南运河仍激湍如故，其鱼之叹，能幸免否，仍未可知。”则此信当书于七月，系为19240811。

635页之19240910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连日津沽各河，水势又涨，……怀祖先生《方言笺证稿》已誊出，至快，不知大序已就否？……致马沈函发走后，彼方有答书否？”此信“水势”事及“致马沈函”事与635页之19240909罗信（系19240811）密切相连。631页之19240731王国维信谓：“王氏手稿中观所抄出者，乃《方言疏证补》，前载东原说而后加以案语，较戴氏说甚为精深，惟钞出者仅二十页，不及一卷，甚可惜也（想原书如此，非缺佚）观拟作一跋，成后当与抄稿并寄也。”王念孙，字怀祖，号石臞。则此信书于七月，系为19240812。

636页之19240917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文郎来，携到手教及石臞遗著，并收到。小徐言庄士敦欲与弟及素相相间，素诺于明晨上午入都（弟同行）……勿语同人，因津沽水势可危同人皆知，即须久留，不能遑返矣。”这与前面所考635页两罗信内容密切相连，也与631页之19240731王国维信的内容相连。则此信当书于七月，系为19240819。

636页之19241003罗信，误。查年历当系19241002。

642页之19250801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此间沈闷如常，惟有三事：一撤王公值班；一添一舌人，其人乃高密旧属，能英法意语；又增一讲官，乃许鲁山主事，均螺江与高密介绍者。”郑孝胥在1925年7月30日离津，次日夜至上海，他在8月2日拜会过许鲁山，其日记记载：“过许鲁山。”[80]这说明许鲁山当时尚在上海，则此罗信之所系日期必误。《郑孝胥

日记》1925年9月15日记载：“荐举罗诚谙英、法、意、德文字，”“许鲁山来。”[81]这合于罗信中的后两事，则罗信当书于八月，系为19250929。

643页之19250806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辽将某太夫人八十寿，安定拟赐匾。”安定指胡嗣瑗。《郑孝胥日记》1925年9月20日记载：“胡琴初来津。”9月25日又记载：“李厚基母八十，星冶先生为之索寿联。”[82]罗信中“辽将某太夫人八十寿”事当合于郑孝胥的记载，则此信当书于八月，系为19251004。

643页之19250810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连日高密来此，倡议设讲筵，渠自讲《纪事本末》，毅甫讲《贞观政要》，此外尚无所闻也。毅甫来借书，故知之也。”郑孝胥等人为溥仪进讲一事，据《郑孝胥日记》1925年7月10日记载：“琴初昨奉面谕：‘命郑孝胥进讲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胡嗣瑗进讲《金鉴录》，温肃进讲《贞观政要》，分日入讲，自午前九时至十时。’”[83]则此罗信当书于五月，系为19250711。

644页之19250811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日来各处考卷到未，何时可毕事？良晤约在何处？至以为念。此次讲筵，始闻尚有贵阳之所在，讲本为《千秋金鉴》。”这与643页之19250810罗信（当系19250711，上已考）密切相连。信中“考卷”是指1925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事。此信又谓：“耶律文正年谱已脱稿否？《辍耕录》中有数事，是否采入？若邳驾无此书，当令儿辈将此数条抄奉也。”641页之19250717王国维信说：“其一条当再检之，可不必抄示也。《耶律年谱》其中人物与事迹考出者已不少，……考卷尚有未到者。赴津总在出月矣。”此回应正应答了罗信中的数个追问。则此罗信当书于五月，系为19250712。

651页之19260109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珏生此次来津，以绢素呈请赐额，且日日催促，并出纸索同人诗什，同人颇冷淡，廿日乃携赐匾以去。”袁励准字珏生。《郑孝胥日记》1926年1月26日记载：“袁励准五十岁，求赐寿，又征作寿诗，余谢不为。”1月28日：“袁励准固求书一小对。”[84]1月30日：“夜，公宴袁珏生于醉春楼。”[85]则罗振玉此信必书于郑孝胥日记的记载之后，当系19260207。

652页之192601中旬，误。信中谓：“维拟以人日后赴津，灯节前返，[86]此次可得六七日勾留，可以畅谈一切，”又谓“中舟生日，维往祝之。”袁励准号中舟，有关袁励准生日事参见对651页之19260109罗信（当系19260207）的考证。则此信当书于袁励准生日之后，即2月。信中又谓：“所假傅沅叔《亲征录》，渠约于岁首携至京师。”则此信当书于年节之前，即1926年2月13日前，此信当系192602。

654页之19260201罗信，误。信中谓：“高密忽来津，又不知唱何高调，今日仅一面，亦不便面询其来意。”查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26年2月1日及前后数月，郑孝胥一直在天津。则表明此信之系年有误。信中又谓：“小山在津就征局……故劝小山仍就馆。”此事当指王国维聘请陈小山作家庭教师一事，王国维在1925年5月11日致长子王潜明的信中说：“汝弟读书事尚未定。拟延一师，闻陈小山考海关不取，不知渠现在厂中有事否？如无事，我处拟请其教书。”[87]再看郑孝胥的行踪，郑孝胥于1925年7月7日至天津，7月9日记载：“至张园，晤罗叔蕴、万公雨。”[88]7月9日是夏历的五月十九日，这与罗信的落款“十九日”正合。则此罗信当系为19250709。

655页之19260208廿六日罗信，此信日期大误。此信谓“蒋孟翁之陈处款项，闻在京未拨付，而陈宅饥寒孔迫，乃垫付百元为卒岁之资，收据奉寄，祈转致。松老葬期在二月，将此

款汇往尤感。”则此信不当排入此年，应当排入1923年，为正月廿六日，此信与557页之19230305罗信中有关陈田葬期事正合，故可断此信必为1923年事，当系为19230313。

附言：此文已经刊发于《九州学林》2007年春季卷（五卷一期）。

此文发表后，阅读其他史料，知此文有四札的订正有误：

《往来》第546页王国维信19220928、第547页王国维信19221009，此两信，拙文前考均后推一月，实属误考。《往来》的排列是正确的，急当改正。

《往来》第548页之罗信19221023，拙文前考，后推一月系为19221122，误，当前移一月。考见补考。

《往来》第591页之罗信192309上旬，拙文已考，排入192310上旬，误。当系为192307中旬。考见补考。

重读《罗王往来书信》及相关史料，又发现前文漏考之札数十，需要重新确定日期，已作补考。待刊。

[1] 本文所考信札标明的页码是该信的起始页，所考信札内的引文不再注明，好在每一信都不是太长。再本文所使用的信件编号格式是年月日编号，如1911年1月1日信，本文作19110101。原信绝大多数以阴历计时、落款，本文亦遵循诸现有成果之例，径将原信的阴历落款改系为公历。又：本文之考订过程尽量简化，如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与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互见之信，有的仅仅作了个简单的是非判断。信中的引文亦尽可少引，至于本文提及信中之某事，与其他信件有关者，亦往往仅仅提及其事。需要详细考证者则详考之。因此，本文对相关书信的考订过程详略不等，这对于阅读不便所带来的麻烦，则请读者诸君见谅。本文仅对书信的写作时间有考订，至于书信转录过程中的问题，则不涉及，相关研究请参阅姚淦铭《〈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〉校正》，见《铁道师院学报》1997年第6期，页81—85。再，此文之写作，就一些文化史问题多次请益于曲阜师范大学的赵传仁教授，谨此致谢。

[2] 罗继祖整理：《观堂书札》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：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》，岳麓书社，1980，第一集，页10—45。

[3] 吴泽主编，刘寅生、袁英光编：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，中华书局1984。

[4] 王宇、朱金枝：《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》，《文献》，1992年第4期，页158—169。又，王宇、王振芬、朱金枝《王国维未刊书札（二）》、《王国维未刊书札（三）》，见《文献》1994年第3、4期，共发表书札32通，后已全部收入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中，其编排与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有异同，无专考之必要，一以本文对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的考订为准。

[5] 刘金库整理：《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》，《近代史资料》，总第92号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，页180—192。

[6] 刘寅生、房鑫亮：《王国维家书》，《学术集林》，卷十一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，页1—18。

[7] 王庆祥、萧立文校注，罗继祖审定，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：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，东方出版社2000。

[8] 吴泽主编，刘寅生、袁英光编：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第474页，整理者注说：“《观堂书札》所收王札，另据经见王札原件，全文收录入本书信集；其中一通因未见原件，从《观堂书札》转录。”但实际不然，如《观堂书札》中1916年之“夏至日”信，即未收入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。

[9] 《凡例》，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，第13页。

[10] 陈鸿祥：《王国维年谱》，齐鲁书社1991，第274页引罗福颐藏《观堂佚札》之“初二日”、“初四日”信，第295页引致蔡尚思两信等，均不见于上述诸结集中。又，沈卫威：《关于王国维给胡适的一封信》，见《史学月刊》1997年第5期，页114—115。

[11] 袁英光、刘寅生：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6，第219页。此谱多有错误，所大量引用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中之书信，并未有细考。本文所考之处，多与现有的王国维年谱不同。又，关于沈曾植在1917年张勋复辟后的行迹，可参考本文第二部分对第二通信的考订。

[12] 袁英光、刘寅生：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，第227页。陈鸿祥：《王国维年谱》，第201页谓七月十五日当9月1日，误。沈卫威：《王国维与北京大学关系考索》，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2003年第1期，页80，则依据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，亦误。

[13] 吴泽主编，刘寅生、袁英光编：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，第210页。

[14] 参见陈鸿祥《王国维年谱》中对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致缪荃孙的书信有所订正。此年谱订正了一些信件日期，亦有许多可商之处。

[15] 陈鸿祥：《王国维年谱》，第191页：“本月二十七日（3月20日），日本富冈谦藏国沪来访，欲观徐乃昌积馀所藏古器物。王氏陪同往访，并自任翻译，沈曾植、缪荃孙亦偕同之。因得见徐氏搜集之古镜及古铜器。”误。20日王国维写信致徐乃昌联系参观事宜，22日去参观。

[16] 中国社会科学院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部主编，钟碧容、孙彩霞编：《民国人物碑传集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1，第375页。

[17] 刘寅生、房鑫亮：《王国维家书》，《学术集林》，卷十一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7，第6页。

[18] 对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中的种种错误，学人已有不同的订正，如陈鸿祥等。亦可参陈秉仁《〈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〉勘误一则》，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130期，1984年10月20日。

[19] 对此信的考订亦可参陈鸿祥《王国维年谱》第181—182页。

[20] 参见：陈鸿祥《王国维年谱》第179—180页对此信，亦以天气入手，将此信提前一月，天气问题只反应在廿五日信中，是。陈氏谓：“若阴历七月二十五，已近中秋，不当有‘亦复不热’语。”其考证似乎不足以说明《全集》整理者的定此信于七月的理由。如王国维19160914信：“今年沪上六、七两月不甚热，至七月杪复热，每日最高至九十余度，直至十三日一雨始凉。”且《郑孝胥日记》1916年8月29日（七月廿九日）亦记载：“热甚，雷雨。”（第三册，第1624页）秋后热是一种常态。再，陈谱亦没有将此信分开，纵然将此信提前一个月，可也无法解释其中廿六日晨信的内容。

[21]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，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，中华书局1993，第三册，第1619页。

[22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623页。

[23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624页。

[24]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，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，中华书局1993，第四册，第1811页。

[25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08页。

[26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04页。“余尧衢约午饭，伯严、子培、雪澄、胡琴初皆在坐，余以商务董事会先去。”

[27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01页。

[28] 见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1514号，1924年8月9日。

[29] 袁英光、刘寅生：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第172页，引此信谓王国维于1917年7月撰《石鼓文考》。误甚。

[30] 参见：桑兵《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7年第5期，第122页。

[31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622页。

[32] 参见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第107页，整理者对此信的注释。

[33] 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，第240、247页注。

[34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652页。

[35] 孙毓筠：《复辟阴谋纪实》，《中华新报》1917年7月17日。转引自存萃学社编集《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》，大东图书公司，1977，第55页。

[36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662页。

- [37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665页。
- [38] 《普济轮船失事》，《申报》1918年1月6日，第10版。
- [39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714页。
- [40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753页。
- [41] 《放赈员报告涑县灾情》，《申报》1918年5月21日，第10版。
- [42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838页。
- [43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841页。
- [44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841页。
- [45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840页。
- [46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851页。
- [47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851页。
- [48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858页。
- [49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06、1907、1908、1908页。
- [50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26页。
- [51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32页。
- [52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34—5、1935页。
- [53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36页。
- [54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64页。
- [55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78—1980页，第1983页。
- [56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3页。
- [57] 见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第373页之19231206信。
- [58] 见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第375页之19231231信。
- [59] 见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第380页之19240117信。
- [60] 见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第606页之19240126罗信。
- [61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3页。

- [62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3页。
- [63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5页。
- [64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三册，第1727页。
- [65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6页。
- [66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7页。
- [67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8页。
- [68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1页之1924年3月23日、3月30日；第1993页之1924年4月9日；第1994页之1924年4月16日；第1995页之1924年4月23日等均有印《四库》计划的记载
- [69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01页。
- [70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5页。
- [71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3页。
- [72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8页。
- [73] 此“民国来文”何所指？尚祈博雅不吝赐教。这对进一步确定本书信的时间大有关系。
- [74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3页。
- [75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85页。
- [76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1998页。
- [77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14页，1924年9月8日记载：“罗振玉派南书房行走。”
- [78] “致马沈书”，见《王国维全集·全集》，第405—407页。
- [79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14页。
- [80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59页。
- [81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63页。
- [82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64页、2065页。
- [83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56页。




[84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85页。

[85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86页。

[86] 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第469页谓2月“27日去天津”，显系意想之辞，至少在22日王国维就已在天津了。《郑孝胥日记》1926年2月22日记载：“晤王国维。”（第四册，第2089页。）

[87] 转引自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，第442页。

[88] 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四册，第2056页。

 关闭窗口  发表, 查看评论  打印本页

发表日期：2008-6-1 浏览人次：56

版权声明：凡本站文章，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。任何网站，媒体如欲转载，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。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。